



大 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一 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4年9月20日，星期二，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临时主席：英萨纳利先生 (圭亚那)

主席：埃西先生 (科特迪瓦)

下午3时35分开会

的一封信，他在信中通知大会，有14个会员国出现《宪章》第十九条所指拖欠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所应付款项的情况。

我谨提醒各代表团，根据《宪章》第十九条规定，

“凡拖欠本组织财政款项之会员国，其拖欠数目如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缴纳之数目时，即丧失其在大会投票权。”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已充分注意到这一规定？

就这样决定。

临时议程项目1

圭亚那代表团团长宣布会议开幕

临时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宣布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开幕。

临时议程项目2

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临时主席(以英语发言)：在请代表们根据议事规则第62条默祷或默念一分钟之前，我提议，鉴于今天是9月的第三个星期二，我们也为大会在其1981年11月30日第36/67号决议中所宣布的国际和平日进行这次默祷或默念，以此纪念并加强所有国家和民族内部以及彼此之间的和平理想。

我现在请代表们起立并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大会成员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临时议程项目115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宪章》第十九条)(A/49/400)

临时主席(以英语发言)：在处理我们议程上的下一个项目之前，我想根据惯例，请大会注意文件A/49/400，该文件已于今天下午在大会堂分发。这份文件载有秘书长给我

临时议程项目3

出席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各国代表的全权证书(规则第28条)：

(a)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临时主席(以英语发言)：议事规则第28条规定，大会在每届会议开始时应根据主席的提议任命一个由九名成员组成的全权证书委员会。

因此，我提议第四十九届会议的全权证书委员会应由下列会员国组成：中国、斐济、洪都拉斯、纳米比亚、葡萄牙、俄罗斯联邦、苏里南、多哥和美利坚合众国。

我是否可以认为，我所提到的国家在此获任命为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就这样决定。

临时议程项目4

选举大会主席

临时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大会各成员开始选举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

请允许我回顾,根据大会第33/138号决议附件第1段,第四十九届会议的大会主席应从非洲国家中选举产生。

在这方面,非洲国家集团主席已通知我,该集团支持科特迪瓦的阿马拉·埃西先生作为大会主席的候选人。

根据议事规则附件六第16段的规定,我因此宣布第四十九届会议以鼓掌方式选举科特迪瓦的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为大会主席。

我十分衷心地祝贺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并请他现在就任主席职务。

我请礼宾处处长陪同主席走上讲台。

埃西先生主持会议。

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阿马拉·埃西先生讲话。

主席(以法语发言):在我就任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之际,我首先要表示最殷切地感谢大会对我的信任以及通过我对我国以及整个非洲所表示的敬意。我意识到,在就任这一崇高的职务的时候,我既接受了极大的荣誉,也接受了重大的责任。我将全心全意地作出努力来圆满地履行这一职责,就象我的前任塞缪尔·英萨纳利先生出色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一样。

在过去的12个月中,英萨纳利先生对大会的工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并在发展和国际合作领域内提出新的思维和发起新的行动方面作出了贡献。作为他的继任者,我将努力维护第四十八届会议到处可见的和谐和对话的精神。在完成我的令人兴奋但又是难以处理的使命的过程中,我无疑将会得到各会员国和秘书处的支持,而且我确信这种支持将会是非常慷慨的。我本人愿意保证十分乐意为圆满地完成我们的工作而努力工作。

在我们内心既感到振奋又感到有决心要实现我们的目标的时候,我首先想到非洲和我的祖国科特迪瓦。我国的价值反映在国际社会的价值之中,而国际社会充满活力的象征就是联合国。我多年来十分荣幸地在此作为其代表的科特迪瓦一向证实它致力于国际合作,并一向致力于本组织的工作。想起这一项以和平、容忍、对话、人的尊严、正义、平等和

团结的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工作时,怎能不令人想起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的名字?科特迪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教导给了我力量,在我行使我的各项职责时我将铭记他的政治思想,而他的政治思想是与《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政治思想紧密相关的。他的精神遗产是以法制为基础的国家科特迪瓦的立国之本,现在依然完整如故。

因此,通过严格地实施宪法法律来促成在科特迪瓦发生的令人注目的变革使我们有理由充满自豪感。目睹亨利·科南·贝迪先生阁下就任共和国总统的民主进程向世界证明了我国人民成熟的程度。亨利·科南·贝迪总统是其杰出的前任所做的伟大工作的优秀继承者,是杰出的经济学家、职业外交家和政治家,他完全了解当今的种种问题。在面对我们世界所面临的种种挑战的时候,他将会在国际社会注视之下作出开明的贡献。

冷战结束以来,各种历史事件发展迅速,使我们不知所措,以致我们必须坚持甚至要求实施1945年建立联合国所依据的各项基本原则——这表明了《旧金山宪章》时至今日还是多么的合理合法。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我意识到在过去50年期间,国际舞台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而且我知道本组织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会员国的数目几乎已经是原来的四倍。当然,这种巨大的变化迫使我们逐渐地调整本组织的功能、任务和工作方式,正如我们其实已经开始在做的那样。但是,为了避免联合国走上废弃的道路,正在进行的变革必须严格地遵守1945年6月26日的《宪章》。

在民族利益不可抗拒以及团结一致的美德日渐消逝的时候,联合国依然是最后求助解决的手段。因此,作为《宪章》基础的团结和合作必须激励我们采取行动。这就要我们这些作为本组织主要机构的大会各会员国的代表们来确定我们各国人民的期望、希望和迫切的需求并对其作出正确的反应。需要对付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也是不可预见的,而且由于它们是相互关联的,所以它们更为复杂。因此,如果我们要确保建议一个真正的国际社会,就必须考虑到团结一致这一概念的所有含义。

从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到建立一个和平与共同命运的世界的过渡是很不容易的。冷战结束以来所见到的种种趋势,其中最明显的是内战的扩散,似乎日渐严重。过去三年期间的82次冲突中,有79次是内部冲突,而在诸如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事件中,它们导致了蓄意的“种族清洗”、甚

至种族灭绝政策。

但是,这些冲突仅仅是我们这个世界走向的一个方面。在南半球和北半球各国,我们同样目睹着日益严重的不容忍和憎恨外国人的行为,简而言之,对于所有不同的事物:肤色、语言、种族和性别,凡是不同的就感到恐惧。此外,还要考虑到由于贫穷、排外和社会不公正使个人和集体遭受到的种种挫折。在人的苦难日益严重时,对我们世界安全的威胁也会突然出现: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的耗尽、农村人口加速外流、中心大城市周围贫民窟的扩大、城市暴力行为、社会结构的瓦解以及滥用毒品。国际恐怖主义、核扩散、传染病的流行、失业、饥荒、自然灾害、失控的人口增长--这些都是当今所关心的问题。当然,这些世界性的威胁之中许多并不是新的问题。有些是在冷战时期在压迫和沉默之下受到了掩盖和抑制。现在它们却以使人类感到十分惊恐的形式重新出现。

令人庆幸的是,冷战的结束推动了各国间和平的恢复。我们怎能不为在争取和平方面取得的相当大的进展而感到高兴?中东局势,巴勒斯坦恢复了在加沙和杰里科权力,最近以色列和约旦签署的协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相互承认,最明显地说明了这种进展。这种和平进程应最终导致实现基于尊重巴基斯坦人民民族权利和该地区各国间关系正常化的全球和平。

我们怎能不提及南非1994年4月的自由和多元化选举安排给人们带来的极大希望?这些选举注定了和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堡垒几十年蔑视人类良知的做法的命运。现在应该感谢联合国在这场斗争中的作用。这场斗争所涉及的根本利害正是人的尊严。

让我们还表示希望,在爱尔兰出现的对话将给这个受难已久的土地带来和平。

此外,在过去几个小时中,在海地恢复宪法法统的前景变得更为现实。安理会决议904(1994)的执行证明法律可以战胜暴力和恣肆,民主合法性可以压倒政治专断。

新的国际局势有利于联合国发挥作用。联合国正在逐渐成为促进国际意愿,努力建立和平和谋求持久性人类发展的理想组织。正如秘书长在其“和平纲领”(A/47/277)和“发展纲领”草案(A/47/935)中所确认,这两个目标是密不可分和互相依存的。他说,和平对于发展如同发展对于和平一样不可缺少。我本人还要补充,不建立一个法治国家,便不可能

有持久的国内和平。

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所确认的道德价值启发了推动民主化措施的通过和对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承认。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成立当然是保护和促进人权的积极方面。但是,有必要注意避免重新落入盲目照搬其他作法的陷阱。非洲国家在1960年开始独立时,这个陷阱使他们照搬外国政府模式,而没有考虑受援国的历史,社会或文化条件。

应充分承认民众参与运动对巩固民主与和平的积极作用。自1989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民主化浪潮仍然非常脆弱,因为这种浪潮基本只涉及发展中国家。如果民主进程不能迅速成功地满足世界上贫穷无靠人民对于正义和公道的渴望,人们担心无法控制的情况可能出现,并妨碍民主。如果和平、自由、公正和平等的价值观念只是一些言词和毫无意义的抽象概念;如果它们不能导致他们生活条件的具体改善,那它对这些民众有什么意义?

本组织对促进和确保和平的一贯关切使它采取了令人赞赏的行动。近年来,这些行动大大加强了。维持和平的干预活动有时引起的各种不同反应不应该妨碍我们对本组织在这个领域中的努力感到自豪。

在不到四年中,我们看到联合国在干预方式方面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联合国从未象现在这样经常地接到关于停止冲突,消除危机和谋求政治解决办法的要求。多年来各方面的经验积累,联合国表现出对他所必须面对的复杂局面的巨大适应能力。但是,虽然各会员国对联合国的行动负有直接的责任,批评联合国还是时髦的事。

我们是否从未清楚自己作出的决定的后果?我们难道从未根据特殊利益采取过行动吗?有必要对关于维持和平和国际安全问题进行坦率的辩论。在这个框架下,联合国和地区组织间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秘书长为此目的所作的努力应得到赞赏。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以及次地区组织之间的合作加强了。继续这种努力以便在防止和解决分歧方面更好地协调行动是恰当的。

大会集中地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利益。因此本组织机构改革的任何尝试会得益于与大会协调行动。但我认为,联合国最重要的工作仍然是促进发展。

有关这方面的任何考虑必须首先基于对国际经济体制

的评估。这个体制的机构基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奠定起来的。鉴于国际经济的动荡，这个体系在50年后明显地需要更新。过去改革全球体系的宏伟方案没有产生任何效果。1981年10月在坎昆举行的南北首脑会议无疑是最明显的失败。那次会议的推动国之一最近说，当时的决定“在重大利益面前实际成了一纸空谈”。

但是，乌拉圭一轮谈判结束时决定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仍应得到重视。这个组织被要求作为国际组织迫切需要的贸易领域的管理论坛之一。同样，我们应进一步研究布雷顿森林集团中各组织的任务和职能以及全球经济安全的思想。

考虑到发展水平的差距——我谨提请大家注意北方国家的人口是世界人口的1/5，而他们的收入是世界的4/5——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会空前的动员起来支持发展。特别是在自1987年以来，全世界军费开支不断下降——每年约递减3.6%，情况更是如此。这样就可能释放出目前达到9 360亿美元的和平红利资金。

不幸地是，这些数目相当大的资金没有用在发展上，官方发展援助不但远未达到国民总产值0.7%的目标，反而减少了。从1980年国民总产值0.38%降到1992年至1993年的0.33%。秘书长应大会要求于1994年5月发布的报告表明联合国发展方案机构和计划所收到的自愿捐助总地下降了10%到20%。对此我要补充说，维持和平行动和紧急援助筹资的指数性增长极大地影响了联合国发展方面的努力。联合国体系（不包括布雷顿森林集团组织）1992年度70亿美元收入的2/3用在维持和平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应该强调，发展中国家在1992年用了1 600亿美元偿还债务——换言之，是使他们受益的援助额的2.5倍。

鉴于这种情况，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的前任英萨纳利先生提请注意对联合国发展工作十分普遍的不满和失望情绪。

奇怪的是，在我们通常称之为捐助国疲惫的同时，联合国体系在发展合作领域中经历着更新其方法、态度和战略的富有成果时期。我谨指出，这方面几个最重要的例子。

自从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第一次作出关于人类发展报告，它一直试图超越抽象数据并使人们了解个人生活发展的现实状况。

我们在业务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国家一级采取了综合办法，该办法特别通过与有关国家当局建立全面对话，试图

更好地确定部门优先事项，协调各捐助国的活动，并促进国家执行各发展项目。

目前就《发展议程》正在进行的辩论将进一步阐明和丰富诸如以持久发展和人类安全概念为基础的各种创新办法，通过这些办法，联合国现在将能够表明它有能力回应我已提及的各种全球挑战。这已得到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和最近的人口与发展问题国际会议的最新结论的支持。1995年3月即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也将使人们有可能全面接受以人类安全为基础的发展概念。

虽然联合国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在《21世纪议程》构架内通过的各项方案的筹资方面仍存在困难，这就提出了捐助国是否已遵守其所有承诺的问题。

在我就发展问题所作的评论最后，我必须特别提及拥有90%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案例。非洲确实是一个受磨难的大陆，因为它总是而且仍然苦于赤贫、自然灾害、迁移和大规模人口外流，以及为内部压迫、有时还为种族灭绝辩护的意识形态方式。国际舆论对非洲的态度已从同情向袖手旁观乃至厌烦摇摆。在最近几年中我曾多少次听过或读到，非洲大陆是一个漂泊的大陆、贫困的大陆、痛苦的大陆。

尽管有这幅消极的景象，我仍相信，我们自1980年代危机以来所看到的趋势是可以扭转的。尽管它有许多尚未愈合的伤口——特别是在安哥拉、利比里亚、卢旺达和索马里——非洲正在恢复信心，并正致力于为自己设计其未来的轮廓。

非洲现在已知道它所面临的多层面挑战和为迎接这些挑战要执行的战略。我们必须在联合国现行项目中继续努力，其中有些项目已经处于执行阶段。我特别铭记《联合国非洲发展方案》及其必然结果商品多样化基金，必须对它们进行进一步审议。

在我们经济自由化的同时，我们必须开辟可以确保我们人口参与的新的政治领域。这是非洲各国在本十年基本能够接受的另一个挑战。一党政权今天在我们大陆上已成为例外，而多元化正在成为惯例。文明社会日益强大并正在各地扎根。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在举行自由和多元选举。分权正变得日益有效。换言之，非洲领导人对其人民负责的原则到处都在多样繁荣的新闻界密切注视下得到确认。当然，通向多元化的道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各政治力量经常发现难于使自己摆脱从一党政权那里继承的制度，新闻自由也

非总是得到正确理解，但尽管如此，仅仅几年内，民主已在非洲取得很大进展。

非洲正是在这种经济和政治稳定化努力基础上，正在处理其他挑战—特别是保护环境的挑战，在这个领域，非洲各国人民通过他们同自然的传统融洽关系，正日益意识到生态危险。

非洲人作为几百年来贩卖奴隶、殖民化和文明冲突的受害者，一直在其联合抵抗过程中梦寐以求地渴望统一。面对各大政治、经济和文化集团在世界其他地区扎根，非洲各国已经为区域和次区域一体化奠定了基础。我们必须坚决地向前进，把1991年6月非洲统一组织通过的计划，即非洲经济共同体计划化为现实。迈向非洲大陆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长征也将解决殖民化所造成各种政治问题，殖民化给我们留下了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称之为“不可磨灭的历史伤痕”的边界。

正如人们可以看到的那样，非洲面对其庞大困难既不听天，也不无动于衷。它正在坚持自己的权利并承担自己的责任，通过设计自己的解决办法，掌握其命运—但这并非没有国际社会的积极支持。

在非洲各国人民正在同意作出最大牺牲之时，国际社会不应放弃理想或萎靡不振。各国人民的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必须得到证实并取得成果。

因此，我要忆及日本前首相细川先生所说的话，他在东京召开的非洲问题国际会议上发言中曾提到如下日本谚语：

“独箭易折，三箭集束则不断”。

他接着说：

“解决非洲所面临问题的关键可能就在于这三支箭：非洲各国政府的努力、非洲各国人民的积极参与和国际社会的热烈支持”。

1995年将是联合国的分水岭。除了纪念其五十周年和联合国宽容年外，联合国还将召开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和世界妇女大会。这些聚会应该导致作出承诺，同时采取具体措施，促进个人和国际团结。

我相信，各会员国将能够使联合国适应当今的需要和挑战。在说这番话时，我必然想到法国作家阿尔贝·卡米的话：

“虽然他们能够做所有事情，但他们敢做的却很少”。

让我们确保子孙后代绝不会因我们不能履行对我们人民的义务而这样评价我们，而联合国体现并代表着我们各国人民的普遍意志。

下午4时10分散会